

《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与英国文化流变中的伦理重构

The Way We Live Now: An Ethical Landscape Refactored

陈敏 (Chen Min)

内容摘要：安东尼·特罗洛普以其特色鲜明的“道德现实主义”白描手法在长篇小说《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呈现了19世纪英国所经历的伦理维度嬗变。该作品诞生于英国文化转型语境中，对19世纪晚期英国文化观念流变中的伦理重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氏通过对伦理主体的细微观察，透露英国文化共同体中难以确定的群体共同性；通过对冒险投机与理性投资的对比性描摹来揭示经济伦理语境的历史流变；揭示婚恋性爱的伦理模式，告诫19世纪末年轻一代（也是即将进入20世纪的未来一代）在追求人生幸福时要洁身自好。本文在这幅“伦理风景”长卷中选择题眼中的“我们”的指代变化、人们对投机的态度转变、婚姻与性爱的道德危机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旨在揭示小说所体现的社会转型期中的伦理主体和经济伦理语境的重构、以及小说如何对年轻一代产生教诲作用。

关键词：特罗洛普；共同体；伦理主体；伦理语境；教诲

作者简介：陈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项目编号：12&ZD17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Way We Live Now: An Ethical Landscape Refactored*

Abstract: Victorian author Anthony Trollope's novel *The Way We Live Now* (1874-1875) is hailed as an "ethical landscape painting" created with distinctive "moral realism" during the cultural transition, and with a wide readership, it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thical refactoring in England in late 19th century. By discussing changes in three main ethical aspects, i.e., the ethical subject, the socio-economic ethical discourse and the ethical crisis in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through the analyses of the signified "we" in the destabilized community, the re-vision of speculation distinguished from gambling, and marital/sexual transac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reassess the value of this novel in moral revelation and ethical teaching.

Key words: Anthony Trollope; community; ethical subject; ethical discourse; ethical teaching

Author: Chen Min is Lecture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nd a Ph.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British literature,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i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i@hznu.edu.cn).

引言

文学家介入社会公共空间的文化批评语境有尺度和方式的问题, C. P. 斯诺曾在其影响深远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 1963)序言¹一开头便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公仆作家”的文学创作做了一番说明:“从特罗洛普时代以前很久直到今天, 公仆们发表小说、诗歌、剧本, 没有一个人想到反对现实”;因为他们受到所任“公职的义务和惯例的约束: 不要直接涉及政治”, 这在他看来“是一种令人满意的道德溶解剂”(1-2)。笔者认为, 斯诺所说的“不反对现实”, 并非回避现实, 而恰如美国小说伦理批评家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所说, 体现了小说家的“客观性”, 即以“中立、公平及无动于衷(impassibilité)”的“技巧”再现现实(67)。这里提到的特罗洛普就是堪与狄更斯比肩的英国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 他在邮政部门担任公职的同时, 每天坚持写作, 以47部长篇小说的出版量跻身维多利亚时期最勤奋多产的作家之列。如果说斯诺的诉求(也是19世纪中叶曾被反复提及的问题)是寻求一种“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 那么特氏的旨趣在于通过现实主义白描手法揭示某种民族的“共同性(commonality)”, 描摹出一幅幅“伦理风景(ethical landscape)”(Wulick 23)。诚如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所言, “现实主义本质上是构建在审美维度之中的认识论体系”(261), 因此尽管同为小说家的亨利·詹姆斯对特氏叙事美学颇有微词², 他也不能否定特氏对英国特性的准确认知和再现;而在另一位美国作家霍桑的眼中, 特氏的小说“就好像是一个巨人从地球上劈下来一大块地来, 把它置放在一个玻璃匣子下……是地道的英国货”(qtd. in 陆建德, “特罗洛普和政治”73)。此言正中肯綮, 《我们如今的生

1 “两种文化”是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 P. 斯诺(C. P. Snow, 1905-1980)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做里德讲座(Rede Lecture)时第一部分的标题, 并于当年出版(*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59), 其中心论点是整个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被分裂为科学和人文(或文学)两种文化, 这一现状业已成为解决重大问题的障碍。随后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及与利维斯(F. R. Leavis)的论战中扩充了这一观点并结集出版(*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1963)。此处所引序言出自后者的中译本。

2 关于詹姆斯对特罗洛普的评价, 具体参见Henry James, “Anthony Trollope” in *Partial Portraits* (London: Macmillan, 1899) 116.

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 1874-1875)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小说犹如精巧的玻璃匣子, 呈现了 19 世纪英国经历的社会转型, 以及该时期文化观念 (尤其是伦理维度) 的嬗变。

值得注意的是, 同样是在社会转型期以文学之笔记录文化观念的嬗变, 特氏不同于狄更斯, 而是对卡莱尔、罗斯金及其追随者的过度悲观和忧虑提出了批评。特氏认为, 卡莱尔没有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善良的事是完美无疵的, 也没有多少邪恶的事里绝对没有一点儿善良的种子”——即特里林 (Lionel Trilling) 所阐释的“道德现实主义 (moral realism)” (qtd. in 陆建德, “特罗洛普和政治” 71)。言下之意, 人间善恶交织共生。特氏正是怀着对这种复杂性的深刻体认 (也许得益于他在世界各地的履职和旅行经验), 进行了新闻报道式的 (journalistic) 小说创作。然而, 学界对此的认识一直存在盲点。例如, 不少学者都会做出以下简单化的判断: “特罗洛普全面批判了维多利亚社会对物质、金钱的崇拜和追求以及人品道德的破坏。” (钱青 310) 有鉴于此, 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以下简称《方式》), 进而对其中展现的伦理风景有更深层的认识¹。下面将以“伦理”为关键词, 从小说体现的伦理主体、社会经济伦理语境的转变、小说如何产生教诲作用等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方式》中的“我们”是谁?

1872 年 12 月, 特氏结束了在澳洲和新西兰一年半的探亲旅行, 经由美国返英, 但甫一回到伦敦“就发现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道德恶臭 (moral stench)” (Sutherland 1999:vii)。正是怀着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愤慨和纠正意愿 (corrective fury), 特氏开始构思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他一生中篇幅最长的小说 (100 章, 共计 42.5 万字)。这一作品正是作家本人伦理选择的结果: 19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财富与价值观念急剧变化, 当时“功利主义盛行, 在激励世人积极进取, 为实现个人利益获得幸福, 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 也带来了过于强调个人利益而走向极端利己的倾向” (聂珍钊 504), 进而“人与人之间除了私利和现金支付关系之外, 再无其他纽带——人的尊严也降到了金钱交易的水平” (殷企平, 《推敲“进步”话语》 246)。有学者指出, 特氏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意识到他所遵循的基督教伦理道德传统受到了功利主义和过于注重理性等思潮的冲击” (承华 139), 因此选择了对功利主义的副产品——欺诈和颓废的社会现象——进行讽刺, 通过荒诞而现实的情节向读者揭示这一时代的真谛——“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即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 (no way to live)。特氏在故事中为我们展示了欺诈

1 关于特罗洛普立场的暧昧性, 可进一步参考左晓岚博士基于对特罗洛普后期派里塞小说 (the Palliser cycle) 研究形成的专著《特罗洛普: 动态社会与小说世界》,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者群像：“业余作家”卡伯里夫人（Lady Carbury）以出卖色相换取虚假的好评；她那游手好闲的儿子费里克斯·卡伯里爵士（Sir Felix）则成天在赌博俱乐部“熊园”（Beargarden）鬼混，跟其他成员一起为赌债打无法兑现的欠条（IOU），并虚情假意追求富商奥古斯都·梅尔莫特（Augustus Melmotte）的女儿玛丽（Mary），而这个梅尔莫特则是小说中最大骗局的策划者。

在《方式》第7章中，小说中代表完美绅士形象的罗杰·卡伯里（Roger Carbury）责怪表妹（未来的妻子）赫塔（Hetta）要去参加梅尔莫特举办的舞会。赫塔令人回味的回答颇具象征意义——“现在大家（everybody）都去拜访他们这家人，罗杰。”（67）¹实际上，赫塔的回答机械复制了几分钟前她母亲卡伯里夫人对罗杰所做的回应，这一重复²提示了“大家/每个人”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它不攻自破的脆弱性——并非“每个人”都去（比如罗杰就不去）。这个缺乏明确指代对象的模糊代词，表明那些去参加舞会的人缺乏实质性理由，或者进一步讲，缺乏独立的信念，这似乎再次回答了小说标题所隐含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空虚且荒唐。殷企平曾采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s）”理论分析《方式》中贵族人物的此类虚言妄行，并得出以下结论：上述“情形都暴露了处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时期的贵族阶层的典型心态”（殷企平，“论《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的情感结构”87）。实际上，在这种矛盾心态的背后，除了新旧社会价值观的更替，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即社会伦理的失序。

至小说结尾，我们清楚地知道：守住道德底线的罗杰是正确的，但不具有普遍性；而“大家/每个人”是错误的，却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细察罗杰与他表弟（费里克斯爵士）表妹（赫塔）之间的分歧，我们会明白，在这样的社会伦理环境中，梅尔莫特是否是大骗子已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人们（即社会伦理主体）是否关心他是不是骗子（即是否承认伦理失序）。特氏寥寥数笔，勾勒出时代人群的共性，不愧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共同特性生成（communal formation）的典例：“大家/每个人”取代具体人物，成为故事各个方面的施动者（actor）、动因（motivator）和对象（object）。而《方式》的标题似乎也可以据此从“the way we live now”，推演为“Who are ‘we’ when ‘we’ live in this way?（如此生活的我们是谁？）”，亦即提出了如何追寻伦理主体共同性（commonality）的问题。本·雅沙（Ayelet Ben-Yishai）就文化中的共同体和共同性（community vs. commonality）作了区分：前者相对稳定，范围有限，其内部成员有自我身份认知；后者具有无限延展性、不确

1 本文中所引《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及所标页码均出自牛津版本（*The Way We Live No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中文译文参考了秭佩的译本：《如今世道》，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 《方式》中“大家都去他们（梅尔莫特）家”多次出于不同人物之口，第21章的标题索性就是“人人都到他们家里去（Everybody Goes to Them）”。

定性和发散性，或者说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共同体（166）。因此，尽管小说中的罗杰与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同属于英国贵族阶层的文化共同体，但由于对社会戾气的立场和态度不同，他们之间丧失了伦理共性。小说第10章（在讨论了维拉克鲁斯大铁路项目之后）就有一处可以检验这种共同性：“梅尔莫特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实际力量（a reality），是伦敦商界伟大的现实力量（a fact）。”（84）被名词化的商业巨头梅尔莫特正是大家（everybody's）所敬畏和幻想的对象，而大家的共同想象也成就了梅尔莫特及其投机工程的真实形象。类似的荒诞情形也可以在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中找到。

具有共同性的人们正是在社交过程中构建并强化了“我们（we）”，小说通过“我们”这一伦理主体的变化（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共同体到兼具包容性和排他性的民族共同体）来反映历史文化的流变和社会价值观的变更。具体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如果细察“我们”的所指（signified），我们会发现从封建贵族阶层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阶层的转化和固化过程。历史学家普遍认为，19世纪80年代（即《方式》出版之后）是一个分水岭，此后的英国贵族阶层快速衰落（Cannadine 25），而这一社会伦理主体的变化势必会在同时代各类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

投机与投资：社会经济伦理语境的转变

W. H. 奥登（W. H. Auden）认为，特氏比任何其他小说家都更了解钱（Skilton 211）。的确，尽管特氏也担忧金融资本和投机心理给社会带来的冲击，而且在作品中借人物之口予以谴责，但他不否认对财富的追求，也不讳言他和母亲¹的写作掺杂了的金钱动机，并在《自传》（An Autobiography, 1883）中多次谈及稿费 and 版税收入。他深谙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学和日常生活政治，以及个人伦理选择的过程，因此他的小说（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的作品）成为维多利亚人了解股票市场基本运作的主要渠道，这也就毫不奇怪了。比如，在《方式》中，拥有纸上金融帝国的梅尔莫特主持了一场疯狂的投机活动；他以修建从美国盐湖城一直通到墨西哥维拉克鲁斯港的大铁路项目为名义，大肆发行股票。而在铺陈这一投机活动的发展过程中，特氏不仅揭示造就梅尔莫特的世道，即堕落腐朽的公众道德和政治伦理，而且担心盲目个人崇拜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借用殷企平的话说，梅尔莫特的发迹“一靠欺诈，二靠助长欺诈之风的社会土壤”（“麦尔墨特的败因”63），而这正是特氏所焦虑的。

维多利亚时期的经济伦理语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变迁过程。人们曾普遍认为投机（speculation）与赌博（gambling）没有区别，比如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往昔与今日》（Past and Present, 1843）中曾经痛斥“赌博式的投机活动”，并把充斥这类投机活动的时期称为“泡沫时期”（232）。

1 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母亲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 1779-1863）也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并依靠她的出版收入养家。

罗斯金 (John Ruskin) 则在《经济学释义》(Munera Pulveris, 1872) 中将金融投机定义为商业彩票 (277)。然而, 随着投机被“驯化”, 人们意识到投机更像是投资, 而非赌博。换言之, 投机成了一种合法的风险行为。19 世纪中叶, 英国法律在对赌博逐渐采取严控的同时, 开始对投机逐渐放宽约束。这一对于投机行为的认知变化, 我们也可从著名银行家卡塞尔爵士 (Sir Ernest Cassel) 写给英王爱德华七世 (King Edward VII) 的信件中略窥一二: “我年轻时, 人们叫我赌徒。随着我业务规模的增加, 我被称为投机者。现在我叫银行家。然而我所做的一直是同样的事情。” (Franklin 635-53)¹ 这种视结果 (盈利抑或亏本) 比行为操守更重要的伦理含混令特氏担忧,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 他有意将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和冒风险的投机行为区分开来。特氏反对投机的态度, 鲜明地体现在《方式》和《首相》(The Prime Minister, 1876) 等小说中², 他尤其警惕以梅尔莫特为代表的骗子开发的海外投资产品和项目, 以及散布假消息引诱无知投资者上钩的股票销售者。特氏对投机近乎倒退式的伦理认知,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英国首相迪斯累里 (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 曾在年轻时投资一项空中楼阁的墨西哥铁路项目, 蒙受巨大损失, 但他仍怂恿他人购买这一亏本股票。特氏曾因此表达对迪斯累里的憎恶, 所以《方式》中的北美大铁路项目极有可能脱胎于此。

不过, 将小说中的这一投机项目设置于美国并引入美国人物 (如赫特尔夫夫人), 也许是特氏的一种文化语境策略, 以期与变化中的经济伦理语境相适应, 并暗示美国这一大前方才是投机的真正家园, 那些与英国人毫不相同的美国人才是真正的冒险家和投机家。梅尔莫特的纽约父亲也让他成了半个“美国人”。对于英国人来说, “美国人 (American)” 一词总是带有轻微的贬义——动词“美国化 (Americanize)” 则有道德上变得可疑这样的含义。即使是令人满意的美国人, 在《方式》中也只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尽管完全不像英国人, 但算不上半个坏家伙” (95)。

性与爱: 特氏小说的伦理教诲

与维多利亚同时代作家相比, 特氏更像是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 他更关注自己所处的转型社会中滋生弥漫于中上阶层的道德危机。学者承华对他所反映的婚恋观和家庭观有所研究, 认为《方式》中适婚女性的情感都遭遇了“金钱与爱情的伦理道德冲突” (137)。例如, 玛丽的追求者都希望通过与她缔结婚姻而发一笔横财, 也正因为看中财产的分割, 她的父亲梅尔莫特

1 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2 狄更斯的小说《小杜丽》(Little Dorrit, 1857) 和《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s, 1865) 也是将投机行为描绘成道德败坏的著名例子。关于投机行为在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中的表现, 可参阅 John R. Reed, “A Friend to Mammon: Speculat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Victorian Studies* 27. 2 (1984): 179-202.

则牢牢控制择婿权，而玛丽自己也希望通过手中的资产赢得心上人，从而摆脱父亲的控制获得幸福；与之形成比照，没落贵族子弟乔治娅娜则希望把自己投放到婚姻市场，把婚姻视作获利的营生，而不考虑其中的情感因素，甚至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而不惜放弃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以嫁给年老貌丑的犹太商人而换取在伦敦市区和郊外的两栋房子，在最终没有得到物质兑现时候无情地撕毁了婚约。特氏通过对“财产交易式婚姻”的刻画，揭示在拜金主义大肆入侵精神领域的社会转型期，维多利亚人的传统婚姻家庭伦理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颠覆破坏，并期望自己的小说发挥教诲和启示作用，使青年读者在面临伦理困境的时候有正确的选择。具体而言，特氏通过在作品中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向读者提示选择职业和婚姻伴侣时的核心问题是诚实与否，而职业选择（choice of a profession）应当包括（对男性来说）遗产的继承管理和（对女性而言）相夫教子的家庭管理（Skilton 212）。¹

我们不妨再以费利克斯爵士为例。后者是在错误的伦理选择中坠入深渊的。特氏为该人物着墨数百页，为他设计的名字 Felix 也别有深意²，其拉丁文词根（fēlix, felicitas）的含义为“幸福；幸运”，然而实际生活中的费利克斯一点也不快乐，面临失去财富和生命的危险。《方式》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费利克斯的堕落并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泰门³，而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着众多缺陷的非典型贵族：他没有能与其贵族头衔相匹配的财富，也缺乏 19 世纪典型“绅士”所具有的优雅和同情心，更欠缺中产阶级男性气概中的勤勉、节俭和清醒。因此，叙述者在小说一开始就宣布：“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糟透了”（18）。不过，他有着帅气迷人的外表，其背后的残酷现实则是：正像乔治娅娜企图用贵族头衔来换取金钱和爱情一样，外表（色相）正是无情无义的费利克斯用来博取物质利益的资本和工具。

特氏将费利克斯的性癖好（sexual habits）作为对这个时代年轻读者的最大警示。小说叙述者和其他人物多次将费利克斯称为“邪恶（vice）”（21, 132, 540）。玛格丽特马克维克指出，特氏以费利克斯的“邪恶性（viciousness）”指代“肉欲和性暴力”，与其命运相联系（Markwick 95），旨在昭示放荡生活对伦理秩序的破坏。学者刘建军认为，“19 世纪新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从本质上说，是和基督教所主张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格格不入的。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以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释放为基本特征的”

1 斯基尔顿（David Skilton）同时指出，特罗洛普较狄更斯更受女性读者的欢迎，因此，笔者认为特罗洛普的小说教诲受众面也更广，效果也更好。

2 世界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 Felix 是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未完成的伟大作品《骗子费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Bekenntnisse des Hochstaplers Felix Krull*）中的主人公，其名字同样具有反讽意味。

3 在莎士比亚悲剧《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中，主人公泰门面对财富的变化经历了急剧的堕落。

(222)。因此，费利克斯在笃信“清心寡欲”这一传统价值观的特氏笔下，从出身贵族的单身绅士逐步堕落为污染社会的小混混：他最终浪迹街头的身影不免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堕落女性（fallen women）形象；美貌不再，形容枯槁，就像饱受梅毒蹂躏之人；直到最后不仅不容于自己的共同体，甚至被国家所驱逐。

特氏“毁灭”费利克斯，貌似简单的正义之举，实际上是一场“在特定历史时刻照亮文学和文化交汇点的复杂事件”（Bleicher 545）。学界对特氏为费利克斯安排的宿命有不同的解释：金凯德（James Kincaid）将费利克斯遭受驱逐视为常见的流放恶徒的皆大欢喜结局（165）；沃尔（Stephen Wall）则认为费利克斯的结局是该小说的一大败笔，理由是这种维多利亚式的道德化书写（Victorian moralizing）削弱了特氏的讽刺文风（60）。基于伦理批评的原则，笔者倾向于认同布莱希尔（Elizabeth Bleicher）的观点，即如果我们考虑特氏通过现实主义小说教诲年轻读者的初衷、特氏对性堕落的鲜明立场，以及《方式》发表同期英国社会舆论对性病控制的公开讨论，那么费利克斯的命运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通过引入疾病话语，特氏以隐喻的方式借用费利克斯的命运劝导年轻男性读者：如果行为失当，男子也会像女性一样容易堕落（546）。这一警示的社会伦理意义在于，特氏以女性的情爱伦理标准审视男子，从而把焦点从传统的男权经济标记转移到个人责任身上，这一伦理调整符合社会转型期对新兴中产阶级的重新定义。

需要说明的是，特氏在《方式》中并未明确描述疾病，他所使用的疾病话语是一种比拟，如将一些人害怕与梅尔莫特接触形容为对社会“污染（contamination）”的恐惧。他用这样的象征性语言将费利克斯与梅尔莫特相提并论，有效地增强了警示作用和伦理教诲效果——我们仿佛听到了这样的画外音：一味追求价值交换的文明进程，犹如重病缠身，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应格外珍视并保持自身的传统道德价值（譬如真、善、美、仁慈和怜悯）。这一警示跟特氏在《自传》中的肺腑之言并行不悖：“爱情这个东西引起所有人的兴趣……如果小说家处理这一主题得法、有益，就爱情提出健康的教诲，那么他带来的益处则非同寻常”（160）。显然，特罗洛普不失为一位“润物细无声”的大众导师。

结 语

综上所述，以伦理之镜管窥特氏对他那个时代精准的全景式记录，我们发现特氏的道德现实主义并不是对善与恶的简单划分和批判，也不是给社会伦理失序开道德药方，而是如加拿大特罗洛普研究专家阿普罗伯茨（Ruth apRoberts）所说，在作品中倾注了一种“道德的审视”（52）。对于《方式》的写作动机和成书过程，特氏在《自传》最后一章中做了详述，尽管他说“这个时代商业中的种种不检行为（commercial profligacy of the age）”促成他创

作该小说，但他也对人类与世界的发展表示了怀疑——

世界究竟是不是变得越来越邪恶，这是困扰了有史以来一切思想家的
问题。人已变得不那么残酷，不那么喜欢暴力，不那么自私，不那么
野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们也变得不那么诚实了吗？如果
这样的话，一个在诚实方面一天不如一天的世界能被认为处于进步状态
吗？（353-4）

克拉彭（J. H. Clapham）认为，1870-1874年（即《方式》成书前后）是
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115）。处于这一经济繁荣时期的“市俗
价值观”已然上升到一定高度，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陆建德，《破碎
思想体系的残编》41），深刻影响着社会伦理的演变。特氏最后的巨著《方
式》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转型语境中诞生的，并对19世纪晚期英国文化观念流
变中的伦理重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氏通过对伦理主体的细微观察，透露
英国文化共同体中难以确定的群体共同性；通过对冒险投机与理性投资的对
比性描摹来揭示经济伦理语境的历史流变；揭示婚恋性爱的伦理模式，告诫
19世纪末年轻一代（也是即将进入20世纪的未来一代）在追求人生幸福时
要洁身自好，避免被污染。对于如何解决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伦理困境，
特氏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方式》中，乔治娅娜最后选择了和一个牧
师私奔，这或许暗示了特氏所倡导的道德回归方向，即从对金钱财富的膜拜
转回到基督教传统道德观。我们不妨重温一下特罗洛普研究权威萨瑟兰（John
Sutherland）在英国全国上下争论“脱欧”时发表于《泰晤士报》社论中的一
席话：“我们总在‘英国特性（Englishness）’处于危机（比如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比如现在）时重新发现特罗洛普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内核，然后我们像
抓救生圈一样牢牢地抓住他”（2016）。显然，萨瑟兰一语道破了特氏对于
英国文化共同体永恒的伦理价值。

【 Works Cited 】

- apRoberts, Ruth. *The Moral Trollope*. Athens, Ohio: Ohio U P, 1971.
- Ben-Yishai, Ayelet. "Trollope and the Law."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thony Trollope*, edited
by Carolyn Dever and Lisa Niles, 155-167.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2011.
- Bleicher, Elizabeth. "Lessons from the Gutter: Sex and Contamination in *The Way We Live Now*." *Vic-
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39 (2011): 545-62.
-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1.
- Cannadine, Davi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9.
- Carlyle, Thomas.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24.
- 承华：“《如今世道》人物婚恋之伦理解读”，《世界文学评论》1 (2012): 136-39。

- [Cheng, Hua. "An Ethical Analysis of Love and Marriage in Anthony Trollope's *The Way We Live Now*." *World Literature Review* 1 (2012): 136-39.]
- Clapham, J. H.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London: Cambridge U P, 1932.
- Franklin, Jeffrey J. "The Victorian Discourse on Gambling: Speculations on *Middlemarch* and *The Duke's Children*," *ELH* 61. 4 (1994): 635-53.
- Jameson, Frederic. "A Note on Literary Realism in Conclusion." In *Adventures in Realism*, edited by Matthew Beaumont, 261-71. Malden: Blackwell, 2007.
- Incard, James. *The Novels of Anthony Trollope*. Oxford: Oxford U P, 1977.
- 刘建军: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文学传统》,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Liu, Jianjun. *Christian Cul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radition*. Beijing: Peking U P, 2005.]
- 陆建德: "特罗洛普和政治", 《书城》9 (2009): 70-76。
- [Lu, Jiande. "Trollope and Politics." *Book Town* 9 (2009): 70-76.]
- : 《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 [—: *Posui sixiang tixi de canbian*. Beijing: Peking U P, 2001.]
- Markwick, Margaret. *New Men in Trollope's Novels: Rewriting the Victorian Male*. Hampshire, UK: Ashgate, 2007.
- 聂珍钊: 《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 [Nie, Zhenzhao. *An Ethical Criticism of British Literature*. Wuhan: China Central Normal U P, 2007.]
- 钱青: 《英国 19 世纪文学史》,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
- [Qian, Qing. *A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Ruskin, John. *Munera Pulveris, The Works of John Ruskin*. Vol. XVII. Eds. E. T. 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London: Allen, 1903-12.
- Skilton, David. "Anthony Trollope."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Novelists*, edited by Adrian Poole, 210-224. Cambridge: Cambridge U P, 2009.
- C. P. 斯诺: 《两种文化》, 纪树立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4 年。
- [Snow, C. P. *Two Cultures*. Trans. Ji Shuli. Beijing: Sanlian Press, 1994.]
- Sutherland, John. Introduction to *The Way We Live Now* by Anthony Trollope, vii-xxviii. Oxford: Oxford U P, 1999.
- : "Trollope captures the essence of Englishness." In Editorial, *The Times*, 13 February 2016.
- Trollope, Anthony.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 P, 1999.
- : *The Way We Live Now*. Oxford: Oxford U P, 1999.
- Wall, Stephen. "Trollope, Satire and *The Way We Live Now*." *Essays in Criticism*, edited by Stephen Wall and Christopher Ricks, 37. 1 (1987): 43-61.
- Wulick, Anna Michelle. "Speculative Ethics: Victorian Finance and Experimental Moral Landscapes in the Mid-Century Novels of Oliphant, Trollope, Thackeray, and Dickens."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0.

殷企平：“麦尔墨特的败因——兼论特罗洛普笔下的社会价值观变迁”，《外国语》141.5 (2002):

62-66。

[Yin, Qiping. “The Cause of Melmotte’s Failure – Changes in Social Values under the Pen of Trollop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141.5 (2002): 62-66.]

—：《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 *Debating the Discourse of “Progress”: A New Type of Novels in the 19th Century Englan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胡玲玲：“论《我们如今的生活方式》中的情感结构”，《外语教学》24.1 (2003): 86-89。

[— and Hu Lingling. “On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The Way We Live Now.”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4.1(2003): 86-89.]

责任编辑：张连桥